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八十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四六期 ——
（二〇〇一年一月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1 b）

【亡灵祭坛】	无声无息的受难者陈彦荣	王友琴
	李敬仪和吴天石：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受难者	王友琴
	长埋心中的块垒——沉重岁月的剪影	唐龙潜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史海钩沉】

无声无息的受难者陈彦荣
• 王友琴 •

陈彦荣，男，1929年生，1966年时是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1966年8月27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拷打。当天夜里陈彦荣被打死。死时37岁。他的妻子第二天被放回家，遍体鳞伤。“红旗”红卫兵把陈彦荣的尸体与另一同时被打死的人一起送火葬场烧掉，不留骨灰，但是要陈家付出28元钱火葬费。

陈彦荣家住北京海淀区蓝旗营109号，恰恰位于“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附近。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组织“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也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彭小蒙和“红旗战斗小组”的热烈支持。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是一个和“红卫兵”类似的在1966年6月间出现的组织。在这封信之后，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迅速蔓延建立。同时，校园暴力首先在北大附中等校发生。大批教育工作者遭到毒打和侮辱。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此校红卫兵打死，成为北京学校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1968年8月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庆祝文化大革命。（据后来参加组织游行集会的办事人员说，是几十万人而非一百万人，媒体多报了数字，显然是为了壮大声势。）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话。这无疑是对正在发展的校园杀戮的极大的鼓励和推动。在8月18日接见大会后，红卫兵对和平人民的暴力迫害和杀害的规模急速升级，被打和打死对象从教育工作者扩展到大批的北京普通市民。

1966年8月27日是星期六。傍晚的时候，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家里包著饺子，等家人回来吃晚饭。陈彦荣是个普通工人，妻子是家庭妇女，他们有七个孩子。虽然长子已经参加工作，但最小的一对双胞胎才三岁，经济上不宽裕。只有周末才能买几毛钱肉包一顿饺子。因为猪肉贵而蔬菜便宜，他家的饺子馅也总是菜多肉少，但是他们总是吃得很香。陈家住著很小的两间平房，很挤。陈彦荣的儿子陈书祥，1963年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以后，没有升大学，留校当了初中的老师。参加工作后，他就从家里搬了出去，住在学校的单身者集体宿舍里。

那天下午，陈书祥肚子痛，去清华校医院看病。医院诊断是慢性阑尾炎。然后他从校医院回父母的家中。那时他还没有钱买一辆自行车，总是步行来往。走了半个来小时，六点左右，快到蓝旗营家门口的时候，看到自家门口围了好多人，有二三十个，都是穿绿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的邻居张俊英老太太站在门口，远远看到他过来，连连朝他摆手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快快离开。但她没有开口说话。陈书祥明白过来以后，扭头就走。走到街角，他转过弯后就跑了起来。他紧张得忘了肚子痛。他一口气跑到附近的一个当干部的亲戚家。把家中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亲戚，想讨个主意。亲戚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又跑到他工作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他向当时的“教师核心领导小组”的组长说了家中发生的情况。没有人能帮助他。陈书祥不知道家里正在发生什么。他只感到深深的恐怖。他预感到自己家要出大事了。

前一天，也就是8月26日的晚上，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负责人主持了一个大会“斗争”校长和老师。在五楼的大阶梯教室里，学校的老师和行政干部进来的时候，被分成了两组。一组是所谓“牛鬼蛇神”，他们被命令排成一排挨打。红卫兵除拳打脚踢之外，还用铜头皮带和用塑料跳绳象麻花一样拧成的鞭子，抽打“牛鬼蛇神”。“斗争会”从7点一直开到12点多。“揭发”“控诉”和毒打交替进行，还穿插著高呼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等。到了后半夜，散会的时候，主持人宣布，明天，也就是8月27日，所有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一律下到班里去。那潜台词分明是到各个班上挨斗挨打。8月26日晚上被打得最重的有清华大学主管附属中学事务的副教务长邢家鲤，校长万邦儒，副校长韩家鳌，共青团团委书记顾涵芬，物理教员刘树华等人。邢家鲤、万邦儒和韩家鳌被严重打伤。顾涵芬被打得失去昏死过去，被扔在自行车棚子里，她的丈夫来把她背回家去。顾涵芬的头发被剃去半边，即当时所谓“阴阳头”，她的一只眼睛被打得几乎完全失明。物理教员刘树华26岁，刚刚结婚不久。他以前曾经追求过别的一个女子，未成。但是他的有关故事却被学生写在大字报上，说他是“流氓”，还画了大幅的漫画羞辱他，在8月26日晚上，又在大庭广众下毒打他。“斗争会”结束后，刘树华回到他和人合住的房间。他妻子不在北京工作，他结婚后仍住在清华的集体宿舍“明斋”。他回到房间里，又悄然离开。他到了清华大学锅炉房，爬上锅炉房的大烟囱，从烟囱顶上，往里面跳了下去。据看到尸体的人说，因为从很高的烟囱里面直直地落下，刘树华的两条大腿骨头几乎完全插入了他的身体，极其可怕。刘树华死的时候，妻子怀孕不久，家中还有瞎眼的老爹。后来他的妻子和瞎眼老爹多次到清华附中“上访”，无结果。刘树华比陈书祥早两年开始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书。他的死给陈书祥心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但是他还没想到他自己的父亲紧接著遭到更可怕的死亡。

这天并不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第一次打人。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儒和韩家鳌，从8月初起就不断被打，几次打得血流在地。还有一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剃了头发和挨打。这天掀起的是打人狂潮的新一浪。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第一次红卫兵大集会之后，红卫兵从学校“杀向社会”，除了焚烧书籍毁坏文物外，还进行大规模“抄家”并打死人。暴力愈演愈烈。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区的杆栏市，一个以前的小业主李文波被抄家和殴打。据红卫兵当时宣称说，“阶级敌人李文波举刀砍杀红卫兵”。此事立刻传遍北京城。文革后，据有忏悔心的红卫兵说，李文波根本没有动手刀砍红卫兵，只是曾要求红卫兵让他的妻子上厕所。在当时，这一事件不但导致了李文波夫妇和杆栏市地区大批市民被打死，而且，成为在全北京掀起更狂暴的打人高潮的借口。“血债要用血来还”成为红卫兵新的暴力行动的口号。这一事件后的第二天，8月26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在教学楼前作动员，负责人之一激动地说：“他们开始报复了。我们不能手软。”当天白天，他们毒打了一批“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其中有的学生几乎被打死。晚上，又召开“斗争会”，在会上动用暴力，直接导致了刘树华老师的死亡。第三天，8月27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抄了陈彦荣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走。

天色全黑以后，陈书祥又回到蓝旗营家中。这时红卫兵已经离去。他进了家一看，父母都没了。他的最大的弟弟12岁，也被打了。最小的一对双胞胎妹妹才3岁，都还没有吃晚饭。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墙上黏著一些生饺子，那是母亲准备的周末晚饭，还没有煮，残破的饺子东一个西一个的摔了一地。陈彦荣的子女们不知道红卫兵把他们的父母抓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红卫兵会对他们的父母作什么。但是从连日来目睹的暴力行为，他们知道巨大的灾祸已经降临在他们头上了。他们度过了一个恐惧的夜晚。

第二天，他们的母亲刘万才被放回来了。母亲遍体鳞伤。母亲进家门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红卫兵让送28块火葬费。

他们的父亲陈彦荣已经被打死了。

8月26日来抄家的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这些人来到陈家的时候，陈彦荣还没有下班，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家。他们要刘万才拿出金条，手枪和“变天账”，刘拿不出来，他们就把刘打了一顿。五点多他的大儿子陈书祥回到家门附近又逃开的时候，陈彦荣也还没有回来。陈彦荣回到家门口的时候，也有好心的邻居朝他摆手，要他躲开。可是陈彦荣没有反应过来，他要进家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进门以后，红卫兵就要捆他。他见情况不对，就往外跑。红卫兵在后面追。陈彦荣跑进旁边的院子里，被抓住了。他先在他自己家里被打了一通。接著，“红旗战斗小组”的人叫来一辆卡车，把陈彦荣和其妻子拉到清华园中学。他们俩被绑在暖气管子上，用皮带和铁条抽打。那时，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也已经在那里被关多日，被打得死去活来。陈彦荣和其妻子在清华园中学被打了一段时间，又被拖上一辆卡车拉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内。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是文革中北京最早开始殴打老师和同学的学校。1966年7月底，领导学校文革的“工作组”被撤，江青和毛泽东大力支持的“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掌管了学校。他们首先毒打了副校长刘美德。他们剪掉她的头发，往她嘴里塞污秽物。刘美德当时怀孕。有一次记者来访，红卫兵强迫刘跪在一张桌子上，由一人站在后面把脚踏在她背上，以体现毛泽东说的把敌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摆好架式照了相后，又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刘美德的孩子出生后很快死亡。他们把几十个老师职员打入“劳改队”，折磨殴打。他们让图书馆管理员李某跪在一个抽屉里，动弹不得，用火钩子打她。李后来被打死。当时去过

北大附中“革命串连”的一名北京大学学生说，那里的气氛使他们都感到毛骨悚然，因为整个学校就像一个“大刑讯场”，多间教室里都在打人，不断听到被打者的惨叫声。有一个红卫兵（名字不提），鞋子上沾著血，腰间的铜扣皮带上也沾满血，高声大气地说，他的皮带“吃荤不吃素”。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也是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制造地。这个对联流传全国，伤害了无数青年人。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诅咒为“混蛋”，遭到各种侮辱甚至殴打。比如，高中部的一个学生朱同，父亲在1957年划成“右派分子”，他因此被关在一间地上有水的房间里供“示众”，象笼子里的动物被观看。朱同被打成重伤，不能走路，后来是爬回家去的。初中一年级的一个女学生万红，只因父亲是“右派份子”，站在一个凳子上被“斗争”，一边被咒骂一边被铜头皮带打。然后有红卫兵同学把她脚下的凳子一脚踢开，她从凳子上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

陈彦荣和刘万才被押到北大附中以后，在那里，他们又被绑起来，继续被打。他们被拳打脚踢，还被用木棒和铜头皮带抽打。“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一边打，一边问：“你是不是地主？”“你是不是富农？”“你有没有罪？”“你该不该死？”

陈彦荣和他的妻子，被从大概9点钟的时候一直打到半夜。后半夜一点左右的时候，陈彦荣死了。快咽气的时候，他跟妻子说“我要喝水。”妻子向看守的红卫兵要水。没有给水。过后不久，37岁的陈彦荣就死在了妻子面前。

那天晚上，跟他们在一起被毒打的，还有一个比他们年纪大的女人。他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在当晚被打死了。

陈彦荣的妻子被放回家的时候，“红旗战斗小组”的人对她说：“你回家拿28块钱来。”当时的火葬价格是28元钱。

1966年夏天，在北京的中学里曾经流传著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吗？”这28块就是指的火葬费。打人的人这样说，觉得很得意，以为表现了他们打人的无限权力和对被打死的人的轻蔑。

28块钱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特别是对工资低人口多的陈家来说。陈彦荣家里拿不出28元钱。陈彦荣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就是同情他们愿意借钱给他们的人也不能不心存疑虑。大儿子陈书祥东借西借凑全了这笔钱。他准备把这钱送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把父亲的尸体送去火葬场。

当时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权力机构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掌握。原来的校长等等都已经是被“斗争”的对象并且遭受著野蛮的肉体折磨。陈书祥作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工作人员，要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收其父亲的尸体。按照当时的规则，需要由本单位领导机构开一张“证明信”。他的这张领尸“证明信”，是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开的。“证明信”的全文如下：

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

我校陈书祥到你校接洽其父事（已死），请让他取回尸体，按政策给以适当处理。

此致

敬礼

在手写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字样下，盖有红色的茶杯口大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圆形图章。

陈书祥拿著这一“证明信”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走到学校门口，那里的恐怖气氛使他犹豫再三，不敢进去。殴打还在校园里继续进行。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也打他们的儿女，这些人当时被红卫兵叫做“狗崽子”。北大附中最先发明和使用这个词的地方。这个文革新词的含义非常清楚。陈书祥不由得害怕进去以后在那里他也会被打。徘徊了一阵，他在校门口听到有人说，今早有两具尸体被拉走烧了。他想其中之一必是他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他改变了主意，没有进北大附中去问他父亲的尸体事。他无声地离开了。他把那借来的28元钱交给了母亲。后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来他家拿走了那28元钱。

据北大附中校内的目击者，一位老师，说，曾经看到有一具死尸丢在校内空地上，有红卫兵骑著摩托车（抄家抄来的）从死尸上碾过来碾过去。不知道那是否是陈彦荣的身体。

陈彦荣的尸体被送到火葬场焚烧后，他的骨灰被丢掉了，没有保存。留下来的是一张未被使用的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给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的证明信。因为陈书祥那天没有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去领父亲的尸体，所以没有交掉这张证明信。后来，他把这张东西保存了起来。

这张领尸体的证明信写在一张有三个小洞的活页纸上。当时红卫兵没有专用信笺，但是他们已经有了图章。茶杯口大的红色圆印子赫然于纸上。这种圆形图章一直是共产党或者政府行政机关所用，通常被称为“公章”，代表权力。当时流行的说法，也把“掌握权力”称为“掌握印把子”，即掌握图章。

这一未被使用的“证明信”从一个角度表明了那个时代发生的事件和社会风貌：（1）在红卫兵运动的产生地的暴力迫害程度。（2）红卫兵组织执掌行政大权的情况。他们的权力不但超过了原先的学校领导，而且具有在文明社会中从来没有人有过的杀人大权。他们打死一个人，既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上的审判，也不需要经过任何上级的批准。打死人以后，他们没有觉得惊慌震动，更没有觉得有罪恶感。北大附中的红卫兵处理了死尸，还不忘找到陈家要家属付出28块钱的火葬费用。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出处理死尸的“证明信”，写上年月日，盖上红卫兵的图章，一付处理一桩例行公事的样子。从行文口气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把打死一个人当作什么严重的事情。他们的一个老师的父亲被另一个学校的学生打死了，对他们好像是一件普通公事。

对于1966年夏天的校园暴力和杀戮，至今没有过一个细致如实的报告和描写。这种情况造成了种种关于文革的误解，甚至包括那些试图批评和谴责文革的人。比如，有一种看法是文革发生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的影响所致。其实，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并不象1966年夏天那样杀人。我们知道著名的包公的故事。因为他是著名的清官，皇帝特别赐予他虎头铡刀，可以自行决定对人处以死刑。包公用此铡刀，处死了皇帝的女婿陈世美。但是很清楚，包公是特别的人物才有此特别的权力，而不是别的官员都可如此。高官的儿子女儿也没有过这样的杀人权。古代确实有大量枉法的事情，产生过大量的冤案。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法律不合理，古代的法律程序也不合理，但是古代还是有一个法律程序。杀人判刑，要经过法律程序，否则就是土匪强盗或者罪犯的行为了。文革中中国共产党开除刘少奇党籍，制造

伪证甚至逼死证人，在相当程度上倒还可以和古代的冤狱相比。至少文革的领导人刘少奇还认为需要一些伪证，所以他们还成立了“专案组”，费心制造了一批伪证。可是北京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几千个老百姓，都象陈彦荣这样，没有经过任何一点法律程序，不用提供罪名和罪证，也不由刽子手行刑，就由一伙红卫兵随意打死。北京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这种做法的野蛮和残忍，是前所未有的。

陈彦荣被打死了。他家人没有了主要生活来源。他的大儿子当中学老师，每月工资是37元。要负担母亲和六个弟弟妹妹的生活，单靠37元工资十分艰难。当时也非常难找到赚钱的方法。那个时代的统治者耗费国家的无数财力物力搞文革，普通人用自己的劳动赚钱糊口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罪恶。陈彦荣的孩子们想尽了办法挣钱过日子。他们到荒地上打草，晒乾后卖给牛奶场。他们养兔子，卖给收购站。他们还拣大字报纸卖。当时政府无限提供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浆糊。单位里和大街上都一批接一批地贴出了大量大字报和大标语，不知用掉了多少纸张。旧大字报可以当作废纸卖给废品收购站，三分钱一公斤。但是从墙上直接撕大字报是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的。当时一些穷孩子就守在贴大字报的那些地方，有人来贴新大字报需要覆盖旧大字报的时候，他们就一涌而上，把旧大字报先撕下取走。1966年，在北京的冬天的严寒中，出现了一批这样的拣大字报纸的孩子们。他们穿著不太暖和也不太乾净的衣服，拖著大筐子，在街上奔走，脸蛋和双手冻得通红。这些孩子中就有陈彦荣的孩子。据清华附中的一个红卫兵的文章说，他曾在北京团城上写过八张纸（一般的书本只是这样一张纸的 $\frac{3}{2}$ 分之一）一个字的大标语。有些人甚至还在诗中赞美他们所写的标语字体之大，如文革时代最红的“革命诗歌”《理想之歌》中就如是写。这些人以写大字标语为壮举，把浪费纸墨当作“革命豪情”洋溢的表现。但是对这些拣大字报纸糊口的孩子们来说，那个“革命”从来就毫无浪漫色彩可言。

陈家的人在陈彦荣被打死以后，曾经给当时掌管北京的中共北京市委写信呼冤，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六年以后，陈彦荣的孩子长大要分配工作。当时年轻人的工作分配主要取决于家庭出身，所以陈书祥及其弟妹后来转而要求为被打死的父亲做个“结论”。没有“结论”，陈彦荣的长大了的子女就不能分配工作。他们的父亲被打死了。他们不能要求追查凶手，却还得乞求给他作个“结论”。事实上，到了九十年代，还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在实在不能否认他们打死平民百姓的事实的时候，就转而分辨说，他们当时打死的人是“坏人”，拒绝认错。

陈家所住的蓝旗营，属中关村街道办事处管辖。后来办事处作了调查。陈彦荣从小就在北京做工，先在清华大学和北京钢铁学院做过校工，1965年进了中科院当工人。陈彦荣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工，在1917年就开始在清华工作，1958年退休。他的老家在北京大兴县。他在清华做工的时候，他的妻子留在乡下。他把在清华大学赚的工钱攒起来，在乡下老家买了一些土地。五十年代初“土改”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就是陈彦荣的母亲，被划成“富农成份”，但未被戴上富农“帽子”。这些就是北大附中红卫兵来抄陈家并打死他的“理由”。1973年，陈彦荣被打死七年之后，中关村街道办事处给陈彦荣做了“结论”。这个“结论”甚至没有给家属一个副本，所以现在无法抄录在此。但是在下面引用的1979年中关村办事处又一个“结论”中，提到这个结论。据说1973年的“结论”说陈彦荣是“误伤致死”。当时能够得到一个“结论”，家属们就感到十分庆幸了。因为陈彦荣的“结论”的说法分明包含着当时当局坚持打死别的人并不错，那些人被打死是应该的。虽然事实上在被打死的数千人中，没有一个人被判过死刑，甚至没有被判过任何罪。

1973年，文革领导人开展了一个“反回潮反复辟”运动，打击任何对文革的批评和不满情绪。陈彦荣的大儿子陈书祥因为说过“我父亲死得冤”，在清华附

中的会议上被点名道姓地批判，说他“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有杀父之仇。”在当时，“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文革的逻辑是，哪怕按照文革时代的规则父亲被杀错了，儿子感到委屈也是“罪”。紧接着，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又开始了。孔子的关于“仁”的思想遭到严厉的攻击。除去别的目的，攻击“仁”实际上是为文革中杀死陈彦荣和无数受难者的残酷行动再次制造理论依据。

1976年，毛泽东死去。在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并继而否定文革之后，1979年，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又给陈彦荣做了一次“结论”。这个结论是寄给各个子女的工作单位的。这时，政工部门的工作方式也有了改变，除了寄给工作单位之外，也给了陈彦荣的家人一个副本。此信如下：

你处XXX同志系我中关村街道六区居民陈彦荣的子女。我中关村街道六区居民陈彦荣同志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扫四旧时期，被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迫害致死。

经过复查该同志没有问题，经过街道党委研究，给予陈彦荣同志平反昭雪，并撤销第一次结论。

现将结论寄给你们，请将原先结论及有关材料予以销毁。

中关村街道办事处 政治组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其中提到的“第一次结论”，就是上面提到的现在无法看到的那一个。

一个月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发出了下列决定：

关于陈彦荣同志抚恤金和生活困难补助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由北大附中红卫兵将陈彦荣同志拉到学校，被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迫害致死。关于陈彦荣同志被迫害之死的政治结论由中关村街道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已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附中党支部写报告经一办同意，给陈彦荣同志丧葬费240元；抚恤金180元；生活困难补助1000元，共1420元。

陈彦荣同志不幸去世之后，爱人体弱多病，家有七个孩子，当时只有一人参加工作，现有四人参加工作，有一人待分配，二人上初中。鉴于上述实际困难，经党支部委员会讨论，由北大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批准，再给陈彦荣同志的家属生活困难补助1080元，共2500元，两次付清。

北大附中党支部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加盖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支部委员会圆形图章)

这个文件的第一段话，在语法结构上有问题，也没有准确写出事实。但是原文如此。“被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迫害致死”，是当时所有的平反书上的公式性的套话。陈彦荣是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的。红卫兵是毛泽东直接支持的，而且毛泽东

还特别写信支持北大附中的红卫兵。十分明显，这是因为避讳谈及毛泽东以及红卫兵的责任，所以只好采用这样的含糊的甚至语法上不通的说法。文革后的当局只准把文革的问题归责任于林彪和“四人帮”。

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在1966年8月27日那天也被打成重伤，身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疤。1979年她拿到那两千五百块钱的时候，说：“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呀。”然后，她大哭，说：“我要钱干什么？我要人哪。”

付给这一笔钱的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支部委员会。这个支部委员会的成员在陈彦荣被打死的时候，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并不掌管学校，其中有的成员自己也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严重打伤。

至于这2,500元钱从哪里来，是另一个需要想想的问题。这钱当然来自工作的人们。普通的人民辛苦工作，有的受到伤害，有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如陈彦荣，其他人即使没被打或者没被打死，最后还要分摊这样的一笔开支。

陈彦荣的死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1966年8月27日，陈彦荣被打死的那一天，据一份“内部”的统计，北京有228人被打死。第二天有更多的人被打死。由于每日有数百人被活活打死，再加上大量被打被侮辱后自杀的人，北京城猛然增加了大量的死亡人数，以致北京的火葬场的焚尸炉供不应求，出现了火葬也要排队等候的情景。由于对被打死的人的高度蔑视，红卫兵不准火葬场保存个人的骨灰。有的家属出于恐惧也不敢要求保存骨灰。另外，从技术条件方面说，火葬场也难以作到。从一些红卫兵的打人场所送来了大批死尸，有的是由卡车运来的，有的是由平板三轮车运来的，一车要装多具尸体，尸体衣衫破烂，没有姓名标记。大量尸体堆积在火葬场里。当时正是八月炎夏，气温很高。火葬场放了大量冰块镇在待烧的尸体堆上。平常火葬场焚烧的尸体，都是身体干净服装整齐的。让死者整齐地离开人世间，文明社会的人们已经这样作了数千年了。但是这些人被从打死的现场直接送到了火葬场，加上他们是被打死的，尸体上有大量的血，所以尸体堆上冰水和血混合流淌，气味极其可怕。目击者说，惨不忍睹，恐怖至极。

1966年8月29日，陈彦荣被打死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一篇社论，通栏大标题是“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的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社论还说：“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英雄的红卫兵万岁！”这样狂热的鼓励，加上煽情而模糊不清的对攻击对象的定义如“寄生虫”“吸血鬼”等等，日接一日，越来越多的人象陈彦荣一样，祸从天降，被活活打死。

在1966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了一份文件，标题是“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报告了在当时刚刚过去的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的“破四旧”中的“战斗成果”，其中有被没收的私人房屋，有抄家搜来的黄金白银和现款，以及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1,772人。关于这1,772个受难者，只有数字，没有人名。作为文革的战利品，这些人和被没收的金银和钱列在一起，他们的姓名当然不被认为有必要写出。这个文件也未“传达”给普通人。

十三年以后，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先已经死去的跟“四人帮”一伙的谢富治也在《北京日报》上被点名批判。谢富治曾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在关于谢的长达近万字的文章里，提到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文章只是简单地提到这一数字，没有说他们是谁，没有说出任何死者的名字，也没有说他们是被谁打死的。陈彦荣是否被计入这1,772个无名的受难者中，无从知道。那一时期，报纸杂志发表了一批文章，是关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在那时被平了反的人们的。但是这些文章所写到的人，只限于非常高级的干部和一些社会著名人士。即使对他们，也限于写他们生前的种种美德，很少写到他们是怎么死的。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运动高潮时被打死的人，都是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和普通的老百姓。他们被打死的时候，没有任何可能表示丝毫的抗议。在文革后，他们中有些人的家属得到了一些钱。因为陈彦荣子女幼小等原因，陈家得到的钱比较多，有2,500元。但是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组群，他们没有机会被媒体提到。他们的家属也没有可能向社会说出他们的冤情。他们始终是无声无息的受难者。

1966年的8月，被红卫兵自豪地称为“红八月”，写入他们的文章和诗歌中。红卫兵在所谓的“红八月”的主要活动，除了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和焚烧书籍毁坏文物之外，就是抄家打人，制造了北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场杀戮。但是这些杀戮在当时和在文革后，都从未被报告。在80年代和90年代出版的三部大型文革史和两本关于红卫兵的几百页的专书中，都没有写出1966年8月的血腥杀戮。几千个被活活打死的人，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组群，一次又一次被忽略不计。文革的大图景也因此被歪曲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一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当年的红卫兵向陈家人表示道歉。是这些人忘记了，还是隐瞒着？或者，他们从来不认为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人的生命在他们那儿不值一提？文革以后，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的领导人之一彭小蒙，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诉说她自己在文革中受了迫害。在文革的第一年，她是毛泽东和江青亲自表扬过的人，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作过大会讲话，红极一时。后来，残酷的“革命”继续扩大打击目标，把她和她的父母那样的高级干部也当作了攻击对象，也是事实。但是，她绝口不提她掌权时她的“红旗战斗小组”在北大附中校园里所作的杀戮，也一字未提他们对学校老师和同学的毒打，更没有表示歉意和悔过。

陈家的两个兄弟分别说起三十年前父亲的死，都异口同声地埋怨他们自己，后悔自己当时没能及时想出办法来。他们设想，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的父亲还没有下班回到家中，他们想如果他们机智一点，就会想办法在半路上迎到父亲，不让他回家。如果能这样，他就不会被打死了。他们说，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父亲教育程度低，脾气不好，不善说话，落到红卫兵手里一定没好。三十年来他们常常想这个。他们责怪自己不够聪明，反应不够快，没有能保护自己的父亲。他们深感内疚，觉得他们对不起父亲。但是，谁会想到像他们的父亲这样的一个普通市民，就这样会被红卫兵从家里捉走打死呢？除了文革的领导人和打手，谁能想到这样残酷的结果呢？他们自责，因为他们是儿子，是人，并且有正常人的感情心态。他们不是那种冷血动物。他们会如此抱憾一辈子。

几千人和陈彦荣一样成为无声无息的受难者，但是，对他们的杀害是公开地甚至大张旗鼓地进行的。1966年8月下旬，北京的很多胡同口都有被打死的人的尸体运出来。大多数老百姓虽然不一定知道死者的名字和故事，但是都目睹或者听说了他们的死亡。这些死亡对普通人当然造成了巨大的恐怖。并且，不知道死者的名字和“罪状”实际上更增加了恐怖的威慑力。为了不被打死，为了逃避相当随意的处死，人们不敢说，不敢做，最后甚至不敢想。回顾文革，无数人被折磨，被虐待。是他们喜欢被这样对待吗？显然不是。但是没有人反抗。十亿人中，在文革后能找到的反抗过文革的人，廖若晨星。毛泽东部署的每个步骤，都很顺利地进行。

有人用人民的“愚昧”来解释，有人用群众的“理想主义”来解释。实际上，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必羞于承认，主要是对被打死和被打的可能性的畏惧，使得无人能站出来抗议。矛头指向清楚但是又有相当随意性的暴力迫害，是文革时代众口一词人人从命的现象延续十余年的主要原因。

几千人被打死也是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清理城市的计划的一部份。几千“牛鬼蛇神”被肉体消灭了。还有，就在陈彦荣被打死的同时和之后，根据“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通令”，北京市九个城区近郊区有近十万居民被驱逐出北京。这些人占了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些人被注销户口扫地出门，强行遣送农村地区。他们从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离开北京。他们只被允许带走每人一个锅一个碗和极少量的衣物。他们中有的人在火车站又被守在那里的红卫兵毒打甚至被打死。他们中有的人在火车上被打死。也有的人被送到农村后再遭“斗争”而自杀。这十万人后来的遭遇十分悲惨。但是在当时，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驱逐之间选择，他们只好毫无反抗地离开了。是陈彦荣们的生命和血，使得这场大规模的清洗未遭反抗，就顺利完成了。文革的领导者们则从中大大肯定了他们自己的无边的威慑力量。

也就在陈彦荣被打死的时期，北京砸毁焚烧了无数文物和书籍。当人命都不能保障的时候，没有人会站出来保护文物。尽管这些文物和书籍对收藏者来说非常珍贵，人们也不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书籍和文物。虽然北京是有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但是扫荡书籍文物的红卫兵如《人民日报》所说“所向披靡”。并不是北京人顿时改变了文化观念和欣赏趣味，是因为这一破坏文物的行动是与对人的杀戮同时进行的。

也就在陈彦荣被打死的时期，北京的全部私人房屋被没收了。有私人房产的人几乎都被抄家，包括那些家中有人是共产党员和解放军成员的家庭在内。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的人，有相当一部份是那些有私人房产的人。实际上，北京的私有房屋，特别是那些较大的私有房屋，在50年代已经大量被没收。然后，1966年夏天，北京的所有房屋都不再是私人拥有的了。房产拥有者去政府办公室，排队交出他们的房产证。在生命和房产之间，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同时，除了失去所有权之外，他们还必须让别人搬进他们自住的房屋。私人空间被最大可能地剥夺了。

如果站在文革领导者的立场来看，打死陈彦荣和其他的数千人，显然能造成巨大的恐怖，而巨大的恐怖必然有巨大的威慑力量，这使得文革领导者所要建立的文革的权威，红卫兵的权威和毛泽东的无上权威，未遭些微反抗，就顺利完成了。陈彦荣和其他同时期被打死的几千北京人的血，润滑了文革的红色巨轮向前推进。陈彦荣的死，是疯狂和混乱的残杀的结果，也是一场有计划的清洗城市和建立文革权威的工程的结果。

然而，即使是从文革领导者的立场来看，为了他们的“革命”，打死陈彦荣是“必要”的吗？肯定不是，当时的情况，没收私人房产和个人手里的黄金和银子，用和平的手段而不用红卫兵杀戮的手段，也可以做得到。然而，文革的领导者们用了这种“史无前例”的暴力杀戮，而且为此得意，为此欢呼。动用中学生红卫兵杀戮北京的和平居民，不能只用他们的社会改造的需要来解释，还要理解他们的特别的嗜好。这暴力杀戮本身就是他们的文革目标之一。破坏和迫害，给他们带来了愉悦。他们对此表现出来的欣喜和赞赏，他们那种满意的感觉，他们的得意的笑容和姿势，在拍摄于1966年8月9日的多部记录电影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领导人当时都已经不年轻，但是在纪录片电影上，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比年轻的红卫兵还兴高采烈。

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和其丈夫一起被抓走并被打。她说，那天晚上和她丈夫同

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人，是一个老年女人。她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文革结束之后，没有人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为那个老年女人“落实党的政策”（这是当时所用的语言，意思之一在于强调这是共产党为受害者作了好事，而不可以是受害者通过法律程序申诉的结果）。因此，文革后的北京大学附中负责人不知道她是谁，叫什么名字。没有人来为她申冤，也许，这是因为她已经没有任何亲属朋友存活在世，或者，她的亲友已经觉得“落实政策”对死了二十年的她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不必进行。在那一天，1966年8月27日，她和陈彦荣一起被打死，然后又一起被送去火葬场烧掉，骨灰也被扔掉了。从那时起，她的肉体与名字，都永远地消失了。比陈彦荣更甚，她成为一个无声无息而且无名的受难者。

□ 写于1999年8月

∞ ∞ ∞ ∞ ∞ ∞ ∞ ∞ ∞ ∞
李敬仪和吴天石：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受难者
• 王友琴 •

李敬仪，女，1966年时是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中共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1966年8月3日晚，从家里被拉到校中“斗争会”上，遭殴打和“游街”。在“斗争”过程中身亡，时年53岁。

吴天石，男，李敬仪的丈夫，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文革一开始被中共江苏省委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和李敬仪一起被“斗争”。昏迷两日后死亡，时年56岁。

李敬仪和吴天石，是江苏省最早在暴力性“斗争会”上死去的两个人。就现有资料来看，也是全国在文革中最早在“斗争”过程中被打死的两个人。

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是原来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金陵女子大学是中国最早兴办的现代大学之一，教学品质很高，校园也以典雅美丽著称。1949年以后，学校的领导人换成了共产党人，学校也改换了名字。吴天石是资深共产党员，一直在教育界工作，1966年时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个《通知》，后来这个文件被叫做“516通知”。这个“通知”也一般被视为文革的开端。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于是，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学术、教育、新闻、文艺、出版这五个“界”，首先成为文革的清洗重点。

“516通知”当时只传达到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普通老百姓一年以后才读到了这个“通知”。在“516”通知发出的同时，5月4日到26日，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军队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后来被简称为“彭陆罗杨”，被指控为“反党份子”。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职位，并且被软禁了。毛泽东圈定了名单，北京的中央大报点名批判一批人的作品。

在各省，也象北京，都在当地找到了一批人，作为文革重点打击对象。后来文革进一步发展，从省到市到县，从大学到中学到小学，在每一层每一个单位都要找出打击对象予以严酷打击。在某种程度上，文革就是由于层层处处都有打击对象而全面发动起来的。吴天石就是江苏省的在文革开始被选中的重点打击对象之一。他

是教育厅长，而教育界是“516通知”中说明要“夺权”的五“界”之一。另外，吴天石和另一作者合作编写过一本小册子，题为《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1962年出版，这本书也成了“毒草”。当时正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对其他的出版物也往往照同样的方式作出捕风捉影的“批判”。加上当时即使是教育界领导人出过书的人也不多，写这本书也就成为吴天石的突出的“罪行”。

在文革后，江苏省委的领导人说，他们受到“中央”的压力，所以只好把吴天石当作了打击对象。当时不但江苏，其他各个省也都这样做了。只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干部被“斗争”，文革后“平反”的时候，不同阶段的受害者们都混同在一起。有些人就回避说明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份人也是整别人的人。

吴天石夫妇之死，虽然在文革通史上不见记录，但是因为吴天石夫妇被“斗”死在南京几乎路人皆知，所以老百姓对此也有解释。有人说，吴天石是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比较高的人，所以被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比较低的人整倒。有人说，反正一定要有人被整，所以每一层干部都想把祸水引向别人，用以保护自己。

据1966年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光在文革后写的文章《难以忘却的纪念》（《新华日报》，1986年8月3日）说，当吴天石知道自己成为“点名批判”对象时，曾经去他的家，提出对他的那本小册子《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能否按照郭沫若公开声明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的方式来处理。但是省委书记的回答是：“你的心情我了解，但你同郭老的身份不同，即使省委同意你的想法，也起不了作用呀！”

这里所说的“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是指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郭沫若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著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的这一讲话发表在1966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据说是毛泽东为郭沫若作了这样的安排。“内部”是怎么和郭沫若谈的，至今还没有人说出。郭沫若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后，好像就“过关”了。他成了文革中可能唯一的没有在“斗争会”上挨过“斗争”的文人。虽然他也遭到大字报的批评，受到压力，他的上大学的儿子被抓走并死在关押中。但是每逢节日和大会，他总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名字总还在报纸上，他也还住在原来的宽大的住宅里。那座在北京前海附近的有花园和小山的大房子，原来是北京有三百年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的财产，政府收走后给了郭沫若。

吴天石想要和郭沫若一样作，也就是说，他愿意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愿意认错，愿意悔改，愿意否定自己，愿意服从共产党中央的指示。他不是对抗的，不是坚持己见的。但是他却不被准许这样作。只有郭沫若可以这样“检讨过关”，别的人则非要被重重地整不可。于是，吴天石被停职，被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点名批判。

在文革后的这篇悼念文章里，陈光感叹：吴天石“这位饱学之士竟然天真地相信，只要真心诚意地认个‘错’（说实在的，他根本没有什么错啊），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就能闯过这个关，逃过这个‘劫’。”陈光的感叹听起来是真诚的。但是，怎么才能不“天真”呢？他没有告诉读者一个不“天真”的人应该怎么理解共产党的制度和运作方式。

事实上，回顾历史，在文革中，每一个阶段的打击对象，都采取了承认“错误”，检讨自己的做法。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子，没有人公开表示过对抗。从最开始，“彭陆罗杨”检讨了。后来，刘少奇邓小平检讨了。还有千千万万被“批斗”的人都检讨了。但是，对文革打击对象的讨伐，却并不因此停止，反而更加升级。和吴天石一样，他们都依然被拉到“斗争会”上受到暴力性的“斗争”，其中有的人像李敬仪吴天石一样被当场斗死。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做法。在战争中，只要一方投降，战争也就结束了。投降的士兵，可以投降当俘虏，保全性命。文革却连投降都不准许。对文革的打击对象，不管他怎么检讨认罪，还是逃不掉被殴打侮辱甚至被打死的下场。文革的规则比战争严酷。

为什么这样？对文革的这一特点，只能解释成，打击这些人，不但是一个目的，也是一种手段。因为这种层层设立打击目标和不准投降的穷追猛打的做法，可以用来发动文革运动并且建立文革的无上权威，所以被实施于文革的整个过程中。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指示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攻击该校领导人的大字报，从此开始发动学生攻击文革对象。大中学校停课。大批“工作组”被派到各学校。工作组支持最早起来攻击学校领导的学生，其中有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组自称为“红卫兵”的学生。工作组号召和组织学生“揭发批判”教师和干部，并且宣布一批人“停职反省”并准备“处理”他们。暴力攻击也在这时发生了。在这一阶段，相当数量的老师和干部不能忍受压力和侮辱，自杀了。

但是，在理论上，工作组不提倡用暴力方式“斗争”文革对象。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有学生设立“斗鬼台”，把数十人拉来“斗争”，包括戴高帽子，下跪，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拖，等等。1966年6月20日，当时领导文革的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要求制止学校中的这种“乱斗现象”。他不是要制止“斗”，而是要制止“乱斗”。

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并且下令撤出“工作组”。毛的妻子江青等前往北京大学说“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并且在会上当众拥抱了当着他们的面打人的北京大学附中学生彭小蒙。江青还在中学生集会上介绍了毛泽东“好人打坏人活该”的说法。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彭小蒙表示热烈支持。工作组的撤离，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以及文革领导人理论上对暴力的认可，这三个因素直接导致了1966年8月大规模校园暴力的兴起。

象李敬仪吴天石这样已经被点名批判已经被工作组“揭发批判”过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首当其冲，马上遭到红卫兵的暴力性“斗争”。

1966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的家，把他们拉出门去。这时，他们还穿著拖鞋。他们被架著走，吴天石脚被戳破，一路流血。他们被拉到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那里已经有一个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斗黑帮份子大会开始”。一群干部和教师被拉到台上“斗争”。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黑帮”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这时李敬仪和吴天石就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身体伤害。

接著，他们又被拉到大街上，当时叫做“游街”。开始李敬仪和吴天石还被架著走，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横拖著。从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有一里来路。李敬仪的身上磨得血肉模糊。李敬仪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斗争”。有人用麻绳把他绑起来

，要把他绑在梯子上“示众”。在这一过程中，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脚上的肉被磨光了，昏迷不醒。被“斗争”后，吴天石昏迷了两天，在8月5日死去。

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53岁和56岁，并不很老。他们在经历几小时的“斗争”后死去，可以想见受到的“斗争”的暴力摧残程度是多么严重。

在吴天石死去的同一天，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批斗黑帮”，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折磨致死。卞仲耘当时50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也就在那一天，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撤销了刘少奇在6月间要求“制止乱斗”的通知。

就这样，在1966年8月初，校园暴力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并不断升级。不但是李敬仪和吴天石夫妇，不但是卞仲耘老师，大量的教育工作者被“斗争”而死，还有大批的人在受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暴力进一步发展，从校园内延伸到校园外，大批城市和平居民也被红卫兵抄家、殴打甚至活活打死。

北京和南京，都是有漫长历史的文明古都。学校，更是保存和发展文明的处所。但是，文革中的暴力杀戮，却自南京和北京的学校开始。李敬仪吴天石夫妇的死，卞仲耘的死，标志了文革以所谓“斗争会”来杀戮生命的开始，也标志了这种“斗争会”被广泛应用的开端。“斗争”本来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到那时，1966年8月初，变成了一种在群众集会上对被斗者施加暴力虐待甚至杀害其生命的方式。

具体来说，这些暴力方式常用的有：殴打，包括用铜头皮带抽打；游街，还要被斗者敲打簸箕自报罪名；颈上挂黑牌，还常用细铁悬挂很重的牌子；剪头发，尤其是对女性，剪去半边，称为“阴阳头”；戴“高帽子”，不但是侮辱，有的地方把帽子作成很重的，一如刑具；“坐飞机”，又称“坐喷气式”，是指在“斗争会”上保持低头弯腰双臂后举状如飞机的姿势。加上各种可能是“即兴”发明的残酷折磨。这些都可能置被斗者于死地。

这种暴力斗争会的恐怖，主要在于其暴力的凶猛程度，另外还在于其相当程度的随意性。酷法固然害人，但是至少有稳定性，有言在先，依法处罚。在“斗争会”上，打人者有一群，他们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一时的情绪就可决定下手的轻重。被斗者生死叵测，只能绝对忍耐顺从，“低头认罪”，以免打人者一时性起，就下毒手。在这种“斗争会”上试图说理，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种暴力斗争会的恐怖，还在于其用“革命”的名义。这些暴力行为都是伴随著高亢的“口号”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进行的。任何对暴力的抗议，都会被说成是“反革命”行为而遭到更严厉的惩罚。

从1966年8月初开始，这种暴力“斗争会”成为到处可见的文革风景线。以下是几个例子：

1966年8月4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共青”操场上，近二百名教师和干部被学生拉出“斗争”。他们被挂牌子，戴高帽子，被游街和抄家，被强迫跪在操场的司令台下。

1966年8月19日，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大会“斗

争”第四、六、八中学的负责人和北京市教育局的负责人，在音乐堂的舞台上把这些人打得血流遍地。随后，在同一舞台上，北京第一女子中学、东城区幼儿园等校的老师们也被“斗争”，被打，被剃“阴阳头”。

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礼堂举行的“斗争会”上，语文老师靳正宇，学校的负责人姜培良被打死。在“斗争”过程中，有人叫嚷要拿盐来撒在被打者的伤口上，姜培良的儿子也被强迫打父亲。该校学生曹滨海被指控反抗了红卫兵，他的母亲樊希曼也在那天被打死。打死三个人后，还有红卫兵到姜培良家中，要打死他的全家。幸好他家的人闻讯逃走，才幸免于难。

在文革时代，无数人惨遭迫害，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出来公开反对文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暴力“斗争会”的威慑。

1996年，李敬仪吴天石夫妇死了三十年之后，文革开始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题为《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书中，江渭清说出了和一个和他们的死有关的事情。1966年8月初，江渭清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讨论修改“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共有16条，1966年8月8日通过）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找他和谭启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谈话。江渭清说，他当时已经通过电话知道了吴天石之死。他告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现在，学生把人戴高帽子，拖上街游行，打骂侮辱，把人都搞死了。（江渭清回忆录，528页）。从他的叙述，我们知道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完全了解当时已经发生的残酷的打杀事件。在“十六条”发布之后，暴力性“斗争”大规模升级，愈演愈烈，不是什么最高当局未曾预料之事。

“十六条”用热情赞扬的口气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被称为“闯将”，这“一大批”青少年作出的有突破性的事情是什么呢？事实非常清楚，他们的主要突破，就是这种暴力性的“斗争会”。

事实上，北京的卞仲耘老师被斗死后，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也在当天就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作了当面报告。不过吴德至今没有说出他如何向更上面报告以及那些人的反应。没有人出来制止暴力。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一画面无疑进一步鼓励了暴力的增长。

江渭清的书没有写到，在李敬仪吴天石死后，8月3日所发生的，一直被称为“革命行动”。在南京师范学院，1966年8月26日，又以“清算吴李黑帮”的名义，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斗争会”。校园暴力也在南京的其他学校中发生。例如，南京第二中学的历史老师朱庆颐，也是在1966年夏天，在所谓的“斗争会”上，被该校学生当场殴打折磨死的。南京的校园杀戮也发展到校外。南京外国语学校红卫兵率先打死了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校外的工人。根据北京的一项“内部”统计，1966年夏天，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南京市或者江苏省也应该有这样的统计，但是江渭清的书中没有写出。

由于文革领导人对红卫兵的热情支持，校园杀戮不但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地进行，而且被当作功绩和光荣。在南京师范学院，1966年8月3日的“斗争会”杀害了两个人的生命，可是却从来没有被当作罪孽或耻辱。相反，那里成立的文革组织，以这一日子命名，名称叫做“八三造反师”，简称“八三师”。这个“八三师”是南京文革中最为活跃的“群众组织”之一。8月3日那天的指挥者成为这个组织的头头，后来又成为南京师范学院的新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也成为“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八三师”掌权的时候，在南京师

范学院的校园里建造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为了纪念他们的发起日，他们建造的毛泽东塑像的高度是八点三米。

显然，名称的使用，权力的授予，巨大象征性器物的设立，都在弘扬强化 8 月 3 日这一事件中包含的暴力迫害原则。从文革一开始，李敬仪吴天石先被他们的上级抛出作为打击对象，继而在暴力性“斗争会”上被打死，在他们死后，他们的死亡日期还被用作传播暴力迫害信号的载体，这是一种何等巨大的不幸。

□ 写于 2000 年 9 月

∞ ∞ ∞ ∞ ∞ ∞ ∞ ∞ ∞ ∞

长埋心中的块垒——沉重岁月的剪影

• 唐龙潜 •

◇ 惊悉噩耗

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我不敢自诩为猛士，但我确曾在二十岁的年龄经历了一场类似的惊涛骇浪的冲击。

这张照片摄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重庆红岩村。这是我和那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的第一张合影。定情的照片何以这样凄迷？原来那时正处于人生的最大哀痛中……

这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武斗的疯狂时期，我们则早已从成都下乡到西昌农村当了知青。正在生活艰难得连煤油、火柴、食盐都买不上的时候，一天她忽然收到一封信，是从老家万县寄来的。信的边角已经破裂磨损得不成样子，可以想见那穿越武斗硝烟的不寻常经历。只用手指轻轻一抠，一叠淡蓝的信纸便掉了出来。她没有看完信，忽然哭得呼天抢地，只喊了一句话：天呐，我在农村的全家都被杀了！便一头栽倒在床上。我在惊惶中一一拾起撒在地上的信纸——用小学生习字本写成的，撕下来的地方缺缺丫丫。心狂跳，手打颤，我开始清理这些未编页码、字迹潦乱的巴掌大的纸片。有十多页，整理好先后顺序强使自己镇定下来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内容杂乱无章，颠三倒四，错别字连篇，但有一个信息是清楚的：她在老家万县农村的母亲和三个哥哥全部被杀害了，死得离奇而惨烈，这些纸片似乎页页都罩着血光。还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信写发于两个多月以前，也就是说悲剧在两个多月以前就发生了。我陪着恸哭着的她拿着信到了县知青办。知青办主任是一个仁厚的好人，马上用电话与万县方面联系，证实情况属实后补助了我们的返乡旅费。于是我们向生产队告了假，到有关部门办好各种手续，我以同队知青小组组长的身份陪同护送她开始了三千里奔丧。

◇ 奔丧受阻

到成都后我们找到当时的省革筹（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接待站，递交了县武装部（那时政府已不存在，武装部统揽一切）出具的介绍信。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中年军人，他看过介绍信后一言不发便进另一间屋去打电话。出来时也不看她只盯着我问：“你就叫唐龙潜？”我说的是。他说：“你来一下。”我跟他进了另一间屋，他忽然沉下脸，威严而阴沉地说：“劝你不要去。她母亲是地主分子，她大哥是国民党军官，她二哥是右派分子，她三哥嘛问题还待查。你是知青小组组长，要站稳立场。”这些情况我原本都知道，应该并不吃惊，但我还是吃惊了。我吃惊于他的态度。按那时的观点，就算她母亲、大哥、二哥之类的阶级敌人是死不足惜，但

她三哥是解放后才上学的，高中毕业后才回乡务农，也算是个回乡知青吧，莫非也该死？自然这些话我都没有说也不能说，我只说她本人是知青，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是县知青办让我护送她回乡看看的。我希望他还是转一个证明给万县武装部，即使我不去她一个人去也还是需要的（那时是没有证明便寸步难行的时代啊！）。现在那里还非常混乱，她本人的安全我们还是应该负责的。他说不行，并郑重提醒我她也是属于地主子女。我说这是当然，不过她现在也是我所在小组的知青，对她的安全我也有一份责任。我恳求他不能转介绍就还是把原证明退还给我们。他不同意。我说你知道的，现在没有证明就寸步难行啊！他不耐烦了，瞪起眼：“我叫你不要去嘛，再提醒你一句，要站稳立场！”面对一个比我年龄大一倍的男人，一个军人，一个全省最高权力机构的干部，我觉得自己被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沉寂了一阵，还是鼓起勇气回了一句：“就算我不去，如果她自己一定要去怎么办？”他冷冷地说：“那就是她自己的事了，与组织无关！”

从接待站出来我觉得浑身从头到脚都寒浸浸的，大约走了一条街我才把情况告诉她。寒风中我们默默的相偎在一座桥上，只有心在交流。现实太严酷了，这严酷反而把我们挤压得更近更紧。过了许久，她说：“你还去不去呢？”我说：“你说呢？”这其实是不需要问也不需要答的事，我们心里都明白。

也许是由于苦难炼就了早熟，我们在离开西昌时不仅办了武装部给省革筹的介绍信，还在生产队和大队分别开具了身份证明，只是盖着武装部大印的介绍信被没收以后，我们就失去了到任何权力部门走访咨询或请求保护的资格，大、小队证明的功能只在于说明两个西昌知青到万县探亲请旅社准予住宿。本来已无亲可探，但证明还只得那样写。

准备出发了，我的父母坚决不同意，说重庆那边武斗还没有平熄，混乱得很。再说人家把她全家都杀了，正等着斩草除根，躲都躲不及，你们怎么能再投进去？情况确实是这样，推测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还是决定要去。四个亲人被惨杀，活着的人连去看一看的风险都不敢冒吗？悲绝勇来，无论是什么，是阴谋是陷阱是龙潭虎穴都决定去闯一闯了。

我们去看了她在成都工作的姐姐，考虑到她姐姐当时正生了孩子才几天，本想不告诉她，但哪里控制得住，终于还是出示了那封信。她姐姐缠着头巾躺在床上顿时哭昏了过去。待清醒过来时，她喊出的第一句话竟是：“给江青同志写信！向江青同志反映！老三总是没有罪的嘛！”我只觉得心沉甸甸的往下坠。向江青同志反映？向第一夫人告御状？愚蠢啊！老三总是没有罪的嘛？那么另三位呢？就该死么？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她姐姐几十年来一直夹着尾巴小心谨慎的做人，思想的贫弱早已被磨得和现在的身躯一样。能够喊出这句话，已经是她思维和勇气所能达到的极限了。她姐夫是五十年代的清华学子，工程师，搞机器很内行，此时却一句话也没有，只是跺着脚唉唉的叹气。四个亲人无端遭杀害，这是流血的惨剧；严酷的政治环境还要窒息活人的哀思，这是更深广的悲凉。

我没法说服我父母，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无可奈何只好不辞而别。临行前我留了一封信委托一位好友在我们离开后送给我父亲。后来知道父亲阅信后忧心如焚，居然准备以多病之身花甲之年打点行装到万县来寻找我们。

◇ 劫后万县

劫后的万县纯然一幅破败景象。街上行人稀少，人们神色凄惶，就连相对热闹的码头也是一片沉寂。行船无号，船工无歌，纤夫们扛着大绳赤脚曲背默默地行走在河滩上。大规模的武斗刚刚平熄，零星的枪声还昼夜不停。落成的新坟彼彼皆是，仅一处集中地就达三百余冢。这就是处长江边文化和文明都开化甚早的万县！

蹲在廉价的小旅馆里我彻夜难眠，旋风似的思考着那不无可能的“斩草除根”。她在老家已经没有可信托的人，唯一可找的也就是那位发信给她的远亲。然而这位报信人又正是属于杀害她全家的那个群众组织的成员，他在信中除传达噩耗外又再三捶胸顿脚地呼号自己组织的成员怎样在对立面的强大反击中血流成河。这是怎样的矛盾啊！我问她对那人的印象，她说只是小学时同过学，后来离开老家跟随在外工作的姐姐便没有再见过面。我说现在见面你还认得出他来不？她说能，那人长像有些特别。既然只能找他别无选择，我们开始来设计近于特工的接头手段。首先我按他来信的地址打电话，谎称姓李，是她姐姐单位的同事，出差来这里受她姐姐的委托顺便了解一下她家里发生的事情。鉴于我们住的旅社不能暴露，约会地点定在他来万县城必经的渡船码头。我假说有他的照片，可以认出他来。第二天上午我们提前到达约会地点，察看环境，并商量应付各种不测的办法。当他从渡船上走下来时，她在暗中给我作了指点，然后便隐蔽开去。我继续观察，确信就是他一个人时便走了上去。复杂的接头、交谈、考察、判定进行了一个小时，我领着他到河滩上转圈子，最后才发出了让她露面的安全信号。这是个在当地诊所当“赤脚医生”的年轻人，不论他参加了什么组织，本质还是诚实善良的。

◇ 天降虐杀

从县城到她老家有四十余里，其中有二十多里的山路还不通汽车，虐杀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对立的两派组织互相攻击对方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自称纯而又纯的“红色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军”忽然祭起清肃阶级敌人的旗帜。那手段是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的清肃，从肉体上乾淨彻底地消灭阶级敌人。然而真正是其对立面组织的人大多已得到消息远走高飞，靠这支由民兵组成的“造反军”手中的长矛、大刀、钢千根本碰不到。于是这场清肃的实际对象便主要是早已被监管的无法逃遁的地、富分子和虽然没有宣布监管但实际仍处于被侮辱被歧视地位的他们的子女。疯狂的虐杀已经在距她家仅三十里左右的两个公社实施了，数百名地富及其子女规规矩矩的被堂而皇之地消灭了。恐怖而令人颤栗的消息她的家人应该已有所风闻。也许是觉得无处可逃，也许是觉得多年以来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自问没有搞过什么破坏活动。她的二哥还会认为自己的右派帽子已经摘了，算是回到了人民中间；她的三哥还会认为自己是长在红旗下的回乡知青，除了积极下地劳动之外还凭着拉得一手好二胡丰富了父老乡亲的文娱生活。然而，行刑队已经来了……

一天晚上他们三弟兄从不同地点被同时抓押到离家不远的水库边。老大是从家里被带走的；老二早已搬出去居住，是从另一个生产队抓来的；老三还在为生产队看守场坝，是从晒棚里直接带走的，身上只穿了一件背心。虐杀分设两处，在水库的东西两端。老大、老三在一处，老二在一处。执行这次行动的是一些手握钢千的民兵（其中还有一个二十来岁未成婚的女人），为首的是大队民兵连长。夜黑沉沉的，只有行刑队手中的电筒在闪烁。就位以后隔水两端开始大声喊话：

一边问：“动得手了不？”

一边答：“动得手了！”

按理说这些都是经常见面的乡亲，现在却个个着了魔似的血红了眼，无论怎样的哀告都无济于事。并不锋利的钢千举起来了，像练习刺靶一样一次次戳进骨肉之躯。汨汨的鲜血，轧轧的钝响。没有反抗，没有抗争，只有承受。因为这面对的不仅是一群歹徒的袭击，是“以革命的名义”而执行的死刑判决。一个解决完了又解决另一个，虐杀进行得缓慢而漫长，杀人者是那样从容不迫。

老大向德全，时年四十二岁，戡然一身，妻子在解放后离异跟人去了，女儿死于贫病。四九年当解放大军进逼成都时他正在一所军校里读书，一位教官想带他去

台湾，他拒绝了。一方面舍不得新婚的娇妻，一方面觉得自己并没有罪恶，还仅仅是个学生，能够为新政权所容纳。这幼稚的想法随即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先是被赶回农村老家，接着便戴着反革命帽子接受监管至今。他没有为自己哀求，大概觉得求也无用，或者觉得死是解脱。毕竟当过军人，还有几分豪壮。他在自己全身血流如注时为老三求情，希望留下这个历史清白的弟弟。他的微弱的哀求被对面传来的吼声淹没了，老二那面大概进行得很顺手，有人在朝这面喊：“你们搞完没得？我们搞完了！”老大最后能听见的大概就是这句话。

老二向德厚，时年三十九岁，尚未婚娶，也是孑然一身。新政权建立时他正中学毕业，文化人奇缺，还被招进土改工作队里干了一阵。应该说拥护新政权的态度是鲜明的，工作也是积极的。证据是当他自己的父亲被列入镇压名单时他没有奔走说情，也没有通风报信。父亲死后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四处乞讨，他也保持了立场坚定没有往来联系。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赢得信任，还是被调整到供销社做商业工作。五七年他对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评头品脚，被划为右派遣返农村老家。三年后摘了帽子，但实际上仍处于被监管状态。他早已万念俱灰放荡形骸，得过且过撒d泊无所，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成家立业已属子虚，甚至对于生他也已并不留恋。但他没有老大那样“坚硬”，当钢千一次次戳进肉体时，他发出一声比一声凄厉的惨叫，这惨叫又变成微弱的呻吟和最后的死寂。生命在血流和哀号中蒸发到零。

老三向德高，六三年高中毕业，时年二十五岁。他长得比较单薄，性格也柔弱。喜爱音乐，温文尔雅，爱口失羞。平素邻里相处，总是谦恭退避，连同人发生口角的时候都没有。目睹屠戮大哥的惨状，耳闻隔水传来的二哥的哀号，他早已魂飞魄散，站立不稳，跪伏在地上。人生对于他才开始啊，他实在想活下去。经过几年的苦干和努力，他刚刚修补了破屋；一个女孩不嫌弃他的出身，还向他表露了爱慕之情。浓黑而冷硬的生活已绽开一条缝，未来的日子将多一丝柔情。他将摆脱大哥二哥的命运，可望安家成婚。生命的热力正在体内散发，更多的牵挂和向往托起对于生的渴望。已经有两具陈尸了，他想别人也许可以软下手来。他为自己哀告，承诺一切一切，包括今后每天晚上都为贫下中农义务演奏二胡，随叫随到。他记得大家爱听他拉二胡，除了这能够娱悦乡亲的一计之长他实在也别无所有了。他把生的希望寄托给二胡，脆弱的二胡哪里承载得起。柔细的丝弦怎敌阶级斗争的铁弓，嗜血的钢千还是举了起来……

老三是倦曲在地上受刑的，他已无力支撑起自己的躯体。在血肉被钢铁穿刺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哀求。这可怜的无望的哀求一直持续到说不出话来，最后被垂死时的呻吟所代替。呻吟之声还没有止熄，血糊的肉体已被绳索捆扎起来抛进水库里，任其慢慢毙命。

行刑结束了，大地回复死一般的沉寂……

母亲魏群英，时年六十四岁。老大一夜未归，她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天明后她听到了确切的消息，不是一个，是三个儿子的尸体都已漂浮在水库里。肝肠断裂的她颤颤巍巍地把锅里最后一盆猪食喂给两头小猪，又对着猪咕噜了几句告别的话，然后找绳子准备自杀。但是已经来不急了，自杀的权利已被没收。她被叫去薅秧，有人监视。当劳作完毕她拐着小脚从水田里爬起来准备回家继续自杀程序时，却被告知不准。接着被带到不远处的小学校，关进一间由厕所改成的教室里。这里连她在内陆续集中了七个人。四个六十岁以上的地富分子，都是寡妇女人；三个被认为是持对立面观点的人，都是青壮男人。这些不同“类”的人为什么被搅在一起？奥妙是：已挂牌的阶级敌人是一摊臭肉，一摊狗屎，谁都想把这些狗屎抓来涂在对方脸上，因为这是使对手万劫不复的刹手锏。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百分之五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过“统治者”的瘾

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既侥幸还属于百分之九十五又惶恐于坠入百分之五，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质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

青天白日，日正当午，谁敢相信这阳光下的暴行？然而事实就是这样：一个点燃引线的炸药包从破烂的窗口投进来了，瓮中之鳖们那时是怎样的状态已无从得知。轰然一声巨响，自然血肉横飞，然而并没有完全结束这七条生命。于是又一个个拖出来，投进附近一个用于窖藏蕃薯的土坑里，还是用并不锋利的钢千逐一了断那些哀号……

◇ 告别老屋

我们到达人死屋空的老屋时天已快黑了。不一会悄然溜进来两男一女，是同队三个胆大一些不愿规规矩矩等死而提前逃遁因而得以苟活下来的地富子女。面目呆傻，形容凄惶。尽管他们的母亲已同葬于那个蕃薯坑里，但由于是分子，是阶级敌人，自己也不敢公开表露哀悼之情，甚至连尸也不敢收。他们说：“哪个敢啊，实在忍不住要哭几声也就是在半夜的时候躲在铺盖里头。”这场屠杀虽然在几百人殒命之后被制止，但清理时只轻描淡写地收审了为首策划者，参与杀人的人都没有追究，属于受蒙蔽无罪。上下的认识还止于对分子子女不该滥杀，没有人对分子的死提出异议。当夜寒风呼呼，油灯昏惨。想到参与杀害她一家四口的人就住在周围，不但安然无恙，而且仍然趾高气扬，大家都紧张得不敢合眼。

会不会斩草除根？会不会再来一次？面对这个陌生的地方，这个血腥的所在，说实在的我自己心里也没有把握。她悲痛地在屋里张惶四顾，凄凉的寻寻觅觅，又一次哭昏了过去……

一个分子子女哆嗦着问我：“如果他们再来杀怎么办？”

我说：“自卫。也杀。”

他说：“怕不行吧，他们是贫下中农。”

我说：“也是凶手。”

一生中这一夜我第一次填满了悲壮的豪情，砸了旧家具，在屋里燃起一堆熊熊的火，并给所有在场的人每人发了一件武器：扁担、锄头、菜刀、钉耙……下了拼死相搏的命令。还拍着胸口说：“一切后果由我负责，与大家无关。”

夜风摇曳着老屋，满屋吱吱嘎嘎响。是冤魂来会还是强人来攻？我打着火把提着扁担出巡了一次。后来又有一片声犬吠，我又出巡了一次。就这样通宵警戒到天明。

第二天我们开始处理残留的东西。一把火焚烧了旧衣被，两间破房和两头小猪折价卖给了生产队，还有几只鸡和几件农具当众拍卖。一个参与了虐杀的凶手居然敢来，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大模大样地两手交叉站着。我仔细打量他：四十来岁，赤脚，衣衫褴褛，举止呆笨。他想干什么？是遗憾还未能斩草除根？是未能填饱嗜血的欢快还想咀嚼别人揪心断肠的痛楚？抑或还有什么更恶毒的想法？我在心里权衡着同他体能的对比，紧了紧拳头，觉得可以压倒他。但我更清楚地明白其实无法同他交手，事实上他比我强大得多，那猥琐躯体背负的是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路线和政策。但我还是不能忍受他居高临下的样子，更为了清楚地烙下那张脸，便径直朝他走了过去。他似乎想闪避，我连忙抽出一支烟拿在手上。我发现他伸手接烟时手在发抖，然而当目光对接的时候那眼珠泄出的阴狠却又令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目不转睛的看着我也目不转睛的盯着他，四条人命在胸中澎湃的烈火使我没有退却，铁铸似的立着直逼得他最后低下头去。我没法想像当他举起钢千向一个毫无反

抗的活的肉体戳去的时候怎么下得了手？他未必真以为凶残狠毒就是革命？真以为生活贫困的原因就是阶级敌人没有消灭乾淨？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勇者，怯者愤怒抽刃向更怯者。卑怯而又凶残的人渣本性是难以用“受蒙蔽”一语了之的。

恶有恶报，后来听说此人以戢然一身死于贫病和疯癫。

我永远记得那张丑陋的脸和那个罪恶的名字：杨光银。

返回重庆后在等火车的间隙我们去了红岩村，留下这帧剪影，爱情在苦难中笃定。在此后仍然浓黑的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睁着上下求索的双眼，谨慎地苟全性命。历史的脚步沉重蹒跚，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民族的悲剧。略加改动套用鲁迅的一句话算是对过去的收束，也算是对未来的警策。即：如果有人还想拾起那祸国殃民的利器，那么——

我总要上下四方求索，以寻找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用来诅咒：“以阶级斗争为纲”。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